

## 前言

本文題爲「德國之佛學研究」，分十三部份寫成；目的在有限度地介紹一下德國在佛學研究方面的表現。我們先就方法論一點畧作討論，之後便是德國學者所作出的成果的報導，這主要是廣度上者。由於德國學者在西藏佛教、佛教知識論與禪佛教方面的研究，有特殊的貢獻，故我們特別將之分開來討論。另外，有關德國近年的佛教活動，這本不屬本文的範圍；不過，它的資料亦可助我們對德國佛學研究的了解，故亦畧爲報導一下。而關於中國佛學的研究，我們亦另闢一章來介紹。

本文是資料性的報導文字，自然只能限於所知範圍者。筆者且亦不容作全面而深入的詳細的探討。此種工



# 德國之佛學研究

吳汝鈞

作希望俟諸來者。

又題目中的「德國」，範圍很難限定。通常當然是指德國人，以德語寫成者；但亦有些德國學者好以英語來作研究的，亦有外國學者（非德國之學者）以德語來作研究的。本文自以前者爲主，於後二者則稍爲省畧。例如 Max Müller，他是英籍德人，但他好以英語寫書和翻譯，且其活動主要在英國的牛津，故我們不大注意及他。又如俄國的 Th. Sichebarksky，有時好以德語寫書。他雖是十分重要的佛教學者，我們亦不予十分留意。最後，由於德國與奧國都同屬日耳曼系，這兩國的學者都是用德語的，有時實亦很難知道某學者到底是德國人抑是奧國人，例如著名的維也納學派的 Erich Frauwallner。對於他們的研究，我們亦將之劃於本文的範圍內，而加以介紹。又德語是瑞士流通的語言，瑞士學者亦好以德語寫書，亦有用英語者，例如 Erik Zürcher。我

們在此亦並加介紹。

又此文之作成，在資料方面，筆者除翻檢漢堡大學的日本語言文化學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Japans）及印度文化歷史學系（Seminar für Kultur und Geschichte Indiens）的圖書館的藏書外，從以下的述作中獲益良多，謹此誌明。

1. J. W. De Jong,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Eastern Buddhist, New Series, Vol. VII, No. 1, 2, October, 1974.
2. 水野弘元監修：新·佛典解題事典，春秋社，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第三刷。
3. 西谷啓治編：現代と禪（講座禪第八卷），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三年十二月廿日初版第一刷。
4. Heinrich Dumoulin,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Chan nach Hui-neng im Lichte des Wu-men-kuan*, Monumenta Serica, Vol. VI, 1941 Henri Vetch-Peking, Reprinted by 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 1970.

## 一、文獻學的方法論

關於佛學研究的方法論，通常可分為兩種形態：哲學的與文獻學的。佛教除是一宗教外，它內裏又含有極其精采的哲學理論。從哲學的進路，透過對其觀念與問題的處理而展開的研究，這是哲學的方法論的研究。在佛學研究中，哲學的研究是比較少見的，它的風氣也不很盛。它的重點是在哲學的基本訓練。不懂哲學，便無法在這方面進行研究。俄國的佛教學者 Stecherbatsky，有很好的文獻學基礎，但他的哲學進路，却無寧受到更大的注意與欣賞。他很熟悉西方的哲學傳統，特別是康德的那一套超越哲學。他以這種哲學為參考，研究佛家知識論，表現出輝煌的成果，具載於其巨著「佛家邏輯」（*Buddhist Logic*）中。可以說，這是佛學研究中哲學的方法論的典型，起碼是到目前為止的一個典型。

文獻學的方法論則完全是另一路的。它的重點放在語言學與目錄學這兩個支柱上，而尤重前者。觀念與問題落於第二義，語言的知識則最為關要。在佛學研究而言，則以佛學的原典語文為焦點，由此而旁通其他。在這些原典語文中，梵語與巴利語尤被

重視。這是由於佛教的根源總在印度，而梵巴二語是古代印度用以記載佛教經典的主要語文之故。用梵語、巴利語來寫的資料，由於在印度保存得不好，故多有失佚，特別是前者。因而把這些資料找回來，而加以校訂整理出版，將之翻譯成現代流行的語文，乃成為現代意義的佛學研究的極為重要的事；這亦是文獻學工作的重心。文獻學的方法論的意義，亦可從中窺見。總之，不懂原典語文，便無法談文獻學的研究。西方的佛學研究的大師，如法國的 Burnouf、Lévi，和比利時的 Pousin，都是文獻學方面的。日本的佛學研究，基本上也是走這一路。如近年去世的山口益，便是此中的先進。他實亦相當受法國研究學風的影響。他早年留法，走 Lévi 之路。其後以對「中邊分別論安慧釋疏」所作的研究而聞名佛學研究界。這表現於他的三書中，其一是編訂釋疏的梵本，其一是這梵本的日譯和注釋，另一則是這釋疏的漢藏對照表和梵本索引。這三書總括來說，表現四種工作：整理原典，與各譯本對校，然後譯成現代語文，最後作一索引。這便是文獻學的方法論的典型表現<sup>①</sup>。

儘管德國人擅長哲學思考，不少德哲對人的內部精神生命的力量，有極其深邃的體會；但德國的佛學研究，基本上仍是走文

獻學的路數。不過，這不獨德國爲然。世界的現代意義的佛學研究，不管是在日本抑在歐美，其主流一直都是文獻學的。唯一例外的似乎是印度。印度人善思辨，它又是佛教的根源地，對原典語文的學習，具有先天的優勢。別人要經過多年的艱苦學習，才能搞通一些原典的梵藏巴利等語文；但印度學者很早便能掌握到這方面的訓練，因而可有更多時間與精力，直探佛教哲學的奧蘊。故近年在印度興起的佛學研究，在哲學方面，有相當可觀的成果。例如 T. R. V. Muri 與 Venkata Ramanan 對龍樹及中觀學的研究，即是很明顯的例子。中國的佛教學者中，受日本及西方重視的，如陳垣、陳寅恪、湯用彤、法尊、巴宙等，大抵皆是文獻學一路的<sup>②</sup>。

德國的佛學研究，大抵是順文獻學的路數，從巴利藏的小乘經論和戒律聖典開始，進而及於梵藏的大乘經論和西藏佛學。這些主要自然都是印度方面的佛教；對中國和日本方面的，則極少碰及，可謂絕無僅有。近數十年則稍有轉機，有些德國學者的興趣，轉到研究佛家邏輯與禪佛教方面去；而且都能表現一些哲學與宗教的智慧。開這風氣的，分別是居於維也納的 Erich Frauwallner（近年逝世）與居於東京的 Heinrich Dumoulin。筆者相信，以德國人在思想方面的經驗與潛力，在佛學研究方面，由文獻學的方法論而走向哲學的方法論，將是一條順路，而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 二、佛學研究的開展

德國的佛學研究，是歐洲方面的佛學研究的一個部份。這種研究，和印度學的研究有不可分開的關係；而這又與對印度的古代語文、歷史考古一類密切結合着。Ernst Windisch (1844-1918) 曾寫了「梵語學與印度考古學史」(Geschichte der Sanskrit-Philologie und indischen Altertumskunde) 與「印度之語言學與考古學」(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in Indien) 兩書，此皆是未完成之書，但其中載有不少十九世紀上半期歐洲的佛學研究的資料。這些報導佛學研究的作品，實亦可視爲一種「佛學研究」<sup>③</sup>。

據 J. W. DeJong 氏於「歐美佛學研究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sup>④</sup>一文所載，關於印度方面的資料，在亞歷山大大帝以前，很早便傳到希臘了。這具載於 W. Reese 的「亞歷山大大帝興起前希臘方面有關印度的消息」(Die griechischen Nachrichten über Indien bis zum Feldzuge Alexander des Grossen) 一書中。在早期，有一個稱爲 Megasthenes 的歐洲人，相當通曉印度的事務。他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曾訪問過印度的 Pataliputra，這是阿育王 (Asoka) 在位時的首都。在他的作品中，有關於婆羅門 (Brahmans) 和苦行者 (Sramanas) 的報導，後者被認爲是佛教徒。J. Duncan M. Derrett 曾以德語寫了一本有關 Megasthenes 的書。但在後來的幾百年中，這方面的活動却沉寂下來。約於公元後400年，有一個歐洲學者 Hieronymus (†347-419) 提到過佛陀，他說佛陀誕生於一個處女之血統。此事可見於 A. Dindie 之「佛陀與 Hieronymus」(Buddha und Hieronymus) 一文中。這大概是受到基督教有關耶穌誕生的神話的影響吧。之後又是一個漫長的沉寂時期。至十九世紀的初葉，一個奧國學者 J. Ph. Wesdin (1748-1806) 開始留意語文的問題；他發現梵文與巴利文的關連，以巴利文作爲印度最古老的語文的梵文的一個支流。其後 Albrecht Weber (1825-1901) 將「法句經」(Dhammapada) 譯爲德語<sup>⑤</sup>，他又從本生經集 (Jātaka) 中選出一部份來刊印<sup>⑥</sup>。

以上是有關歐洲特別是德國方面的佛學研究的早期資料。德國的佛學研究，至名學者 Hermann Oldenberg (1854-1920) 出，算是進入比較成熟的階段。前此還是很雛形的。

Oldenberg 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不止留意佛學的研究和翻譯，而且大量校訂整理和出版巴利經典。他於1879-1883這幾年間，陸續校訂和出版律藏 (Vinayapitaka)<sup>⑦</sup>。同時，他又校訂出版「島史」(Dīpavamsa)<sup>⑧</sup>，將之譯成英語。另外，他又和英國著名的巴利文學大師 Rhys Davids 合作，譯了不少巴利經典，如「波羅提木叉」(Pāṭimokkha)，「律部小品」(Mahāvagga)，「律部小品」(Cullavagga 等)<sup>⑨</sup>。

Oldenberg 的佛學研究的成果，主要還是表現於他的「佛陀：其生命、教說與社團」(Buddha, Sein Leben, seine Lehre, Seine Gemeinde)一書中。這是有關釋迦牟尼佛陀的傳記的劃時代巨製，目前有 W. Hoey 的英譯。德國人寫佛陀傳記的書不少，例如 H. Beckh, J. Dahlmann, M. Winternitz, 甚至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塔(Jaspers)，都曾為佛陀作傳，但似乎都不如 Oldenberg 所寫的那樣受到注意。Oldenberg 的這部佛陀傳，其特點是一反前代學者的習慣，把佛陀與神話連在一起。他却是依據巴利經典，理性地寫出有關佛陀生活的詳盡的傳記。他認為巴利經典，能正面提供有關佛陀生活佈教的資料。他又寫了很多環繞佛陀與巴利經典的文章，收入於所謂「小品」(Kleine Schriften)中。他又留意佛教與婆羅門教的關係；他以為，佛教不止在教義方面吸收婆羅門教，而且在宗教思想和感情方面，亦受其影響<sup>⑩</sup>。不過，他還是強調佛教的獨立性，反對把佛教歸屬於婆羅門教或印度教，而為其一支流。

Oldenberg 是最大的佛教學者之一，他的成就是空前的。

又德國學者對佛教與其他特定的教派的關係，感到興趣。有關佛教與數論的關係一問題，有持肯定看法者，亦有持否定看法者，亦有只作保留的肯定的。參加這個討論的德奧學者，有：Oldenberg 本人、Albrecht Weber、Max Müller、Hermann Jacobi (1850-1937)、Richard Garbe (1857-1927)、Joseph Dahlmann (1860-1930)、Richard Pischel (1849-1908)、Paul Horsch 等。佛教與瑜伽派的關係亦是一引起熱烈討論的問題，參加討論的，除了德國學者外。還有著名的比利時的佛教學者 La Vallée Poussin。

### 三、中亞細亞抄本的發現及研究

十九世紀末葉，學者在中亞細亞發現大量佛教資料，那主要是梵文與印度的一種通俗語 Prakrit 的寫本。起先俄國人發起對這方面的研究。其後德國學者 Ernst Leumann (1859-1931) 加入，寫了一個研究報告，題為「有關一種在中亞細亞發現的未為人所留意的語文」(über eine von den unbekannteren Literatursprachen

Mittelasiens)。這個發現，隨着而來的，是西方及日本的學者多次到這個地方去探險，希望能發掘得更多新的資料。其中有著名的英國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他曾先後三次到該地搜集資料。德國學者亦先後去過四次，其中包括 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Georg huth (1867-1906) 和 Von Le Coq (1860-1930)。另外，法國、俄國和日本等國亦分別有學者到該處去。他們搜集到大量佛教的抄本，分別用梵文、和闐文(Khotanese)、畏吾兒文(Uigw)、西藏文和漢文等寫成<sup>⑪</sup>。這些抄本，分別被携返而藏於巴黎、倫敦、柏林、聖彼得堡(列寧格勒)和日本的博物館中。德國的 Ernst Waldschmidt (1897-) 曾編有「在吐魯番找到的梵文手抄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sup>⑫</sup>，把德國學者由1904年至1964年所刊行的梵文碎片全部刊出。又自 Pischel 於1904年出版「相應部阿含」(Samyukāgama)<sup>⑬</sup> 的梵文碎片以來，德國學者在吐魯番探險所搜集得的梵文抄本，亦陸續出版了。

中亞細亞的古代寫本的發現，帶給西方佛學研究界新的機運。這種研究的範圍也不只限於佛學方面，且遍及於古代印度與西域文化的各方面。德國學者 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 在研究這些梵文碎片方面，有卓著的成果。他亦有參加出版從中亞細亞取得的梵文碎片的工作。他出版「佛教劇作的碎片」(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寫了「舍利弗鉢刺迦羅·馬鳴的一個劇作」(Das Śāriputraprakāraṇa, ein Drama des Aśvaghōṣa)，顯示出馬鳴會為舞台劇努力過，而不止是一個大詩人。這對於了解印度的舞台藝術，有重大意義。他的遺作「對佛典語言所應留意之點」(Beobachtungen über die Sprache des buddhistischen Kanons)，對藏經以前的語言問題，作過深刻的探討。他以為，從巴利文與梵文的經典中，可以發現有一種原始的經典 Uṛkanon 存在，那是用一種東方的方言來寫的，稱為 Ardhmagādhī<sup>⑭</sup>。另外，他在「莊嚴經」(Sūtrāṅkāra) 的研究方面，也作出過貢獻。他曾出版莊嚴經的梵文碎片，對有關該經的內容及作者，作詳細的討論。

在最近數十年，由於德國學者出版了他們在吐魯番找到的梵文寫本，使西方的佛學研究有重大的進展。特別是 Ernst Waldschmidt，貢獻最多。他是 Lüders 的學生，繼承了後者的工作。他出版了上面提到的說一切有部的文獻（見註⑦），和「在中亞細亞找到的有關佛教的梵文藏經碎片」（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Sūtras aus dem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kanon）。他曾在其「佛陀滅後的傳承」（Die Überlieferung vom Lebensende des Buddha）中，比對其他巴利本、漢本、西藏本的本文，而對「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的寫本加以分析，把梵文原本和這些本子都加以出版。此外，他的分析的研究還包括其他經典的寫本。

#### 四、小乘經論及有關方面的研究

以上簡畧地介紹了德國的佛學研究的輪廓。我們大抵是就 Oldenberg 的貢獻與在中亞細亞古代抄本的發現與研究為轉捩點而介紹的，中間自然有很多遺漏。以下我們分章再作介紹，希望能補足一點遺漏。首先要談的，便是小乘經論及有關方面的研究。

在巴利經典的研究方面，上面附註⑧提到的 Wilhelm Geiger 是一個大師。他有極好的巴利文學根底。他除編纂巴利文法書（見下面辭典的編纂章）外，又譯有「雜阿含」（Samyuttanikāya）頭二卷；又與 Magdalene Geiger 合作，仔細地研究過在巴利文法中法（dhamma）這一字的意義，寫有「巴利文之法」一辭：主要是經典文學中者」（Pāli Dhamma vornehmlich in der kanonischen Literatur）。他自己又寫有「法與婆羅門」（Dhamma und Brahman）一文。此外，他又曾把「大史」（Mahāvamsa）或稱「大王統史」，見註⑨譯成英語，並出版原典。

另外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學者，就是近期的 Friedrich Weller（1889-）。他是馬鳴「佛所行讚」（Buddhacarita）的專家；他曾刊行了該書的西藏譯本，又廣泛地研究梵文、巴利文、漢文、藏文、蒙文的佛教原典，有「F. Weller 紀念集」（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另外，他又研究「賢劫經」，刊行該經的梵語、藏

語、漢語、蒙古語和滿洲語五種原本，題為「五種語本賢劫千佛名經」（Tausend Buddhannamen des Bhadrakalpa nach einer fünf-sprachigen Polyglotte）<sup>15</sup>。他對語文與版本的興趣的濃厚，恐怕無人能及。

以下介紹其他德國學者在小乘經論方面的翻譯成果：R. O. Franke，德譯「長部阿含經」（Dīghanikāya），其中包括「梵網經」（Brahmajālasutta），「沙門果經」（Sāmaññaphalasutta），「涅槃經」（Mahāparinibbānasuttanta）等。

K. E. Neumann，「喬答摩佛陀的話語」（Die Reden Gotamo Buddhos，此是德譯「經集」（Sutta-nipāta）<sup>16</sup>。Neumann 氏另外又有「喬答摩佛陀僧尼之歌」（Die Lieder der Mönche und Nonnen Gotama Buddhos），這是德譯「長老偈」與「長老尼偈」（Theragāthā, Therīgāthā）<sup>17</sup>。這兩部偈集，H. Oldenberg 與 R. Pischel 亦曾合作校訂出版過。

Nyānatiloka，「佛陀的話語」（Das Wort des Buddha）這是在上面 Neumann 氏所譯「經集」之外的另一部德譯本。另外，Nyānatiloka 又有「彌蘭王的問話」（Die Fragen des Milindo），這是德譯「彌蘭王問經」（Milindapañhā）<sup>18</sup>。此外，他又有「到清淨之路」（Der Weg zur Reinheit，這是小乘論書「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sup>19</sup>的德譯。

J. Dutoit，有德譯「本生經」（Jātaka）<sup>20</sup>。  
H. Günther，「「大事書之說」（Die Sprache des Mahāvastu），此是對大事書的研究。

Wassiljew，「佛教」（Der Buddhismus），此是德譯「異部宗輪論」（Samayabhedoparacanacakra），但是譯自西藏譯本者。

E. L. Hoffmann (Brahmacari Govinda)，「佛教哲學與心理學摘要」（Ein Compendium Buddhistischer Philosophie und Psychologie），這是德譯「攝阿毘達磨義論」（Abhidhammatthasāṅgaha）<sup>21</sup>。  
M. Walleser，「原始佛教的派系」（Die Sekten des alten Buddhismmus），其中有有關「異部宗輪論」之研究。  
O. Rosenberg，「佛教哲學的問題」（Die Probleme der bud-

dhistischen Philosophie)，其中有關係論（阿毘達磨俱舍論）之研究。

德國學者在小乘經論方面的研究，我們介紹至此。最後，在巴利律或戒律聖典方面，V. Rosen 曾對「十誦律」<sup>22</sup>作過詳細的研究。另外，以研究陳那哲學著名的 Erich Franwallner，亦研究過佛教戒律。他在其「最早期的戒律與佛教文學的開始」（The Earliest Vinaya and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Literature）中，強調不同的戒律學派都是源於一種禪度的作品，這禪度是公元前四世紀上半葉作成的<sup>23</sup>。又在研究佛教與政治社會的關係方面，有 Heinz Becher 的「上座佛教國家的佛教、國家與社會」（Buddhismus,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n den Ländern des Theravāda-Buddhismus）。

## 五、大乘經論的研究

德國的佛學研究，雖然是由偏於巴利文學的小乘經論開始，但稍遲的大乘經論的研究，却有相當長足的發展，似有後來居上之勢。後面要特別提出來介紹的西藏佛學、佛家知識論或邏輯，以及禪佛教，都是屬於大乘一系。這可能由於德國人的那種包羅一切的心量，更為接近那不住涅槃、不住生死、雖涅槃而又生死的的大乘精神之故。

在大乘經方面，「金光明經」（Suvarṇaprabhāsa）相當受到重視。Johannes Nobel 即是此中研究的專家。他先刊行「金光明經」的梵本，其後又出西藏譯本，又自製「藏—德—梵字彙對照表」（Wörterbuch Tibetisch—Deutsch—Sanskrit）。另外，他又刊行義淨的中文譯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及其西藏譯本。另一個德國學者 E. Leumann 對此經亦有研究，載於其「佛教文學」（Buddhistische Literatur）中。但他的研究是根據這部經典的北雅利安語本的斷片者。

Friedrich Weller 則在「迦葉所問經」（Kāśyapaparivarta）<sup>24</sup>方面作了很多研究。上面我們說他是佛所行讚的專家，對語文與版本很有興趣。這裏他又以同樣興趣，先為「迦葉所問經」的梵

文原本與西藏譯本作了索引，及後他又先後把這經的四種漢譯本，分別譯成德語，題為「迦葉所問經之德語化」（Kāśyapaparivarta verdeutscht）。另外，他又出版該經的蒙古語本。

其他有關大乘經典的研究，還有如下列者：

Max Walleser·校訂出版「小品般若經」。  
E. Leumann·出版「理趣經」（「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摩耶經」Adhyardhaśatikā-prajñāpāramitā）<sup>25</sup>，又將之譯為德語，並製字彙表。

Fischer-Yokota·德譯「維摩經」（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W. Radloff·德譯「觀音經普門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Samantamukhaparivarto nāmāvalokiteśvara-vikurvaṇa-nirdeśa）。按此即「妙法蓮華經」第二十五「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但 Radloff 的譯文則是根據在吐魯番所發現的斷片而譯成。

在大乘論典的研究方面，可以就對中觀與唯識兩派的文獻的研究來說。由於大乘論典哲學的意味相當濃厚，故德國學者的研究，亦帶幾分哲學的色彩，但基本上還是以文獻方面為主。

德國學者對中觀論典的研究，幾乎全集中在龍樹「中論」的疏本上。Max Walleser 是在這方面十分活躍的學者。他譯有「根本中論無畏疏」（Mūla-madhyamaka-vṛitti Akutobhaya）<sup>26</sup>，又刊行這疏的西藏譯本。另外，他又把青目註「中論」翻譯過來<sup>27</sup>。又出版「中論」佛護註（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itti）的西藏譯本。在月稱註「中論」（Prasannapadā）的研究方面，S. Schayer 的表現是可觀的。這一「中論」的註解，是所有「中論」註解中唯一有梵文原典現存的。故它的出現，予歐美的佛教學者相當的刺激。而這書實亦很有助於對大乘佛教根本立場的了解。S. Schayer 曾作有這書的部份德譯（第五、七、八、十四、十五、十六各章）<sup>28</sup>。此外，Franwallner 亦研究過龍樹<sup>29</sup>。

在唯識宗方面，年青的德國學者 Lambert Schmithausen 曾作了不少研究。他寫「The definition of pratyakṣam in the Abhidharmasamuccayah」一文，考察無著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Abhidharmasamuccaya）中直接知覺（Pratyakṣa）一觀念的意義。

他又對「瑜伽師地論」(Yogācārabhūmi) 中的涅槃觀念作過詳細的考察，寫了「Der Nirvāṇa-Abschnitt in der Vinīśayasamgrahaṇī der Yogācārabhūmi」，這一文很能表現他的哲學觀見。另外，他又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如來藏系統的「究竟一乘實性論」(Ratnagotravibhāga)，寫了「關於實性論在語言學上應注意之點」(Philologische Bemerkungen zum Ratnagotravibhāga) 一長文。Schmithausen 氏，現在漢堡大學印度文化歷史系 (Seminar für Kultur und Geschichte Indiens) 任教，其所授科目，包括佛教史、佛教知識論、唯識學等。

此外，還有 A. Weber 對馬鳴的「金剛針論」(Vajrasūci) ③⑥ 的研究，他出版這部論典，又將之翻譯為德語。

還有一部是代表後期印度大乘佛學的發展的「入菩提行論」(Bodhicaryāvatāra)，甚受德國學者注意。這部論典為寂天 (Śāntideva) 所著，漢譯稱「菩提行經」，天息災等譯。德國學者 Richard Schmidt 曾將之譯成德語，題為「轉向覺悟之路」(Der Eintritt in den Wandel in Einleuchtung)。上面提到的 Weller，亦接觸過西藏佛教，研究過這部論典，為此製了一個藏梵索引。另外，順便一述。上面說及的著名學者 M. Winternitz 曾寫有「印度文學史，II，佛教文學」(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 II, Die buddhistische Literatur) 一書，含有對小乘、大乘佛典的解說，適合一般讀者，但對專門學者亦有用。內中翻譯了不少佛典的文句，讀起來很有趣味。(未完待續)

## 附註

- ① 有關佛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筆者曾在另一文「日本及歐美之佛學研究點滴」(「佛光學報」第二期，一九七七年七月) 中有較詳細的討論。
- ② 陳垣有「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陳寅恪有「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按此是有關西藏與蒙古方面之佛學者)；湯用彤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法尊有「菩提道次第廣論」(按此是西藏宗喀巴著「菩提道次第論」大本之中譯)；巴宙有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ātimokṣa (按此是研究巴利律者)。此皆頗受佛

學研究者注意。

- ③ Windisch 又寫了「魔王與佛陀」(Māra und Buddha)，「佛陀之出生與心路歷程之教說」(Buddhas Geburt und die Lehre von der Seelenwanderung)，「大事書之成立」(Die Komposition des Mahāvastu) 等書。這些書的主要內容，可見於書名自身。按「大事書」(Mahāvastu) 是屬於大眾部系說出世部的作品，富有文學意味，記述有關佛陀的種種事故。

- ④ 見 The Eastern Buddhist, new series, Vol. VII No. 1, 2, May October, 1974。

- ⑤ 按此書後來另有 R. O. Franke 之德譯，題為「法語」(Dhamma Worte)。

- ⑥ 按本生經近年亦有 J. Dutoit 之德譯。

- ⑦ 此是以巴利語傳播者，漢譯與西藏譯皆無此。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各規則，在第一次結集中被收集起來，而成爲律。及後原始佛教教團將之加以整備增補，而成律藏。按佛陀滅後100年左右，原始教團分裂爲上座與大眾兩部；巴利律即爲上座部所傳的戒律。又巴利律由經分別 (Suttavibhanga)，犍度部 (Khandhaka) 和附隨 (Parivāra) 三部組成。經分別即是經的註釋之意；戒律條文的集合即是戒經 (波羅提木叉 Pātimokkha)。戒經又分二種：比丘戒經與比丘尼戒經。犍度部則是有關僧伽工作的種種規定；附隨則是對以上兩部的補足的說明。

德國自 Oldenberg 留意戒律之後，其後有 Ernst Waldschmidt (1897-)，亦注意戒律的問題，寫了「關於一切有部的比丘尼波羅提木叉的殘簡」(Bruchstücke des Bhikṣuni-Prātimokṣa der Sarvāstivādins)。

- ⑧ 「島史」著者不詳。它是四世紀後半至五世紀初作成的，爲錫蘭方面現存最古的編年史詩，由巴利文寫成。又這部書一名「島王統史」，它與五世紀末及以後增廣而作成的「大史」(Mahāvamsa) 同爲錫蘭編年史書，同爲錫蘭史和錫蘭佛教史方面的研究的重要文獻。

又著名的巴利語學者 Wilhelm Geiger (1856-1943) 曾對這兩部史書作過詳細的比較研究，寫有「有關島史大史及錫蘭的歷史傳統」(Diparamsa und Mahāvamsa und die geschichtliche Überlieferung in Ceylon) 一書。

- ⑨ 關於「波羅提木叉」，見前註⑦。巴利律三部份中，其中一個是



健度部，這一部又有大品、小品之分；前者爲「律部大品」，後者爲「律部小品」。「律部大品」有十健度，「律部小品」有十二健度；所載皆是有關僧侶生活的種種規條。

⑩ 關於這點，Paul Horsch 亦寫了「佛教與奧義書」(Buddhismus und Upanishaden)一文加以討論。

⑪ 和闐是我國新疆省西南的一個城市。畏吾兒則是自第八至第十二世紀在蒙古與土耳其斯坦統治下的土耳其人。

⑫ 按吐魯番(Turfan)是我國新疆省東部的一個城市。相當於漢譯雜阿含。

⑬ 這是印度耆那教所用的一種語言。

⑭ 「賢劫經」，又名「毘陀切三昧經」、「賢劫定義經」，計八卷，梵文原典缺，但有西藏譯。漢譯則由西晉的竺法護譯出，全二十四章。賢劫即現在之住劫之意。Weller 氏所刊行者，爲「賢劫經」的另一個本子，即梁代失譯的「賢劫千佛名經」。這兩者有相當的差異。

⑮ 「經集」，巴利語寫成，包含於南方上座部的經藏(小部)中，分蛇品、小品、大品、義品、彼岸道品五章。按巴利語三藏中，有多數的經典現存，皆有其特定的名稱；本經因無特別的特徵，故稱「經集」。

⑯ 「長老偈」與「長老尼偈」是佛陀在世時，長老比丘與長老比丘尼的歌詠結集；兩偈集在文學與思想方面都有很高的價值；貫徹於其中的精神，是一種宗教與倫理的理想，表示一種靜寂而深遠的心境。

⑰ 「彌蘭王問經」，又稱「那先比丘經」，此非佛說者，而是彌蘭王(Milinda)與那先(Nāgasena)的問答紀錄。按於公元前二世紀後半期，希臘國王彌蘭王支配了西北印度，與佛教論師那先討論有關佛教的教理，其後竟出家而爲阿羅漢。這部經即是他們討論的問答記錄。這部經對於研究希臘與印度以至佛教思想上的關係。很有價值。

⑱ 「清淨道論」存於南傳藏經中。五世紀中葉，印度學僧佛音(Buddhaghosa)在錫蘭首府的大寺(Mahāvihāra)中，以當時存在的三藏諸義疏爲參考，本着大寺派教學的正統說，而改造增補當時流行的「解脫道論」(Vimuttimagga)，因而成此論。全書由廿三品構成，以戒、定、慧三學爲綱。本書在南方巴利佛教中，有極高權威；其百科全書的內容，可比美上座有部的「大毘婆沙論」。

⑲ 「本生經」，漢譯作「生經」。此是以巴利語作成，合於南方上座部的經藏(小部)中。此經的內容，是記述佛陀在現生於這個世界之前的前生的種種故事。

⑳ 「攝阿毘達磨義論」爲巴利佛教的綱要書，錫蘭學僧Anuruddha 以巴利語作成。

㉑ 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稱爲律。佛陀滅後，其教團將其戒律加以整理增補，而成律藏，「十誦律」即是由上座部系的化地部分出來的說一切有部所傳的律藏；其內容有十項，故稱「十誦律」。

㉒ 按健度本是篇、章、聚之意。在小乘律中，依部類的不同而集合起來的東西，即是健度。如漢譯「四分律」，即有十二健度。「迦葉所問經」爲「大寶積經」中之一部，屬第四十三會。

㉓ 「理趣經」，不空譯。按此經還有五種譯本：玄奘譯「大般若經第十會般若理趣分」；菩提流支譯「實相般若波羅密經」；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施護譯「徧照般若波羅密經」；法賢譯「最上根本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這些經一方面相當於「大般若第十會理趣分」，另外又相當於「金剛頂經」第六理趣會。

㉔ 「中論無畏註」，被認爲是龍樹自家對其「中論」的註解。此疏只有西藏譯本現存，故Waller 的德譯，亦是根據此西藏譯本而來。其翻譯題爲：Die mittlere Lehre des Nāgārjuna nach der tibetischen Version übertragen(「藏本龍樹中觀教說之翻譯」)。

㉕ 此是據漢譯而來，題爲：Die mittlere Lehre des Nāgārjuna nach der chinesischen Version übertragen(「漢本龍樹中觀教說之翻譯」)。

㉖ 歐美及日本的學者，紛紛參加月稱註「中論」的翻譯工作，但各人只譯一部份，未有一人而全譯者。參加這一翻譯工作的，除Schayer(德譯)外，有Th. Stecheratsy(部份英譯)、J. W. de Jong(部份法譯)、荻原雲來和山口益(部份日譯)等。

㉗ Frauwallner 著有「佛教哲學」(Die Philosophie des Buddhismus)，其中譯有龍樹「實行王正論」(Ratnāvālī)第一章。按「實行王正論」是佛學文獻中較有其特殊性者，它的內容主要是有關大乘佛教的政道思想。

㉘ 「金剛針論」，漢譯者爲宋代的法天。法天以此書爲法稱所作；但現代佛學研究界則考得此書作者爲詩人馬鳴。

㉙ 「金剛針論」，漢譯者爲宋代的法天。法天以此書爲法稱所作；但現代佛學研究界則考得此書作者爲詩人馬鳴。